

经济发展中的地方官员行为研究

——基于政治晋升、财政分权与腐败的视角

郭广珍 李绍平 黄险峰*

摘要：本文同时考虑财政分权、政治晋升和腐败三个因素对地方官员行为的影响，进而构建了理论模型。从中得到的主要结论是，在基本模型中，地方官员对政治晋升的偏好程度越高，则其努力程度越高、腐败程度越低。而财政分权程度越高，官员的努力也越高，但对腐败水平影响却是不确定的。在进一步假设腐败会被惩罚的拓展模型中，基本模型的大部分结论都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只是分权程度的对努力的影响也变得不确定了。除此之外，我们进一步研究了，对官员腐败惩罚的力度和对官员腐败的惩罚准确程度的影响。相关命题表明，如果对官员腐败惩罚的越严厉，并且对官员腐败的惩罚越准确，官员努力水平和官员腐败程度都会变低。通过对研究结论的分析，我们还对以往文献的结果进行了重新解释。

关键词：政治晋升 财政分权 腐败

一、引言

目前，越来越多的现实案例都显示出了官员，特别是地方官员的行为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尽管从表面上看，中国经济的发展是由中央政府政策驱动的，但是经济改革的关键是“征得地方政府的同意和支持”（Li 2003）。而且相关的大量论文也都认识到了这一特征，无论是实证研究还是经验研究，地方政府的作用都被给予了充分的关注。

然而关于地方政府通过何种途径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的问题却存在不同的观点，我们通过对多数相关文献的分析可以总结出三个主要的途径，即分权体制、政治晋升体制和腐败。早期的大量文献都是将研究的焦点集中在其中某一个特定途径上。尽管这种研究方式可以使研究的问题更加集中，但是由于研究对象选择的主观性，使得目前关于中国地方政府行为的研究相当混乱，有种类类似“盲人摸象”的感觉（Saich 2002）。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可以推测研究的结果也会有所差异，甚至相互矛盾，而对文献的综述研究也证实了这一想法（郭广珍 2010）。近期的文献也有将其中两个途径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尝试（傅勇、张晏 2007；周黎安 2008；王贤彬、徐现祥 2009；郭广珍 2009），但我们认为如果将三种因素同时加以考虑，也许可以得到一个关于中国地方官员行为的更加全面的认识。

此外，尽管很多文献，特别是纯实证的文献试图解释官员如何影响经济绩效，但是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则是官员自身的行为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显然，这一问题和政治晋升与腐败是相关的，这样我们就有理由对以往纯实证的文献提出质疑，因为在解释经济绩效时，各变量之间可能产生共线性和自相关性的问题。当然，也有文献从各个角度对官员自身行为进行了分析，但是并没有将政治晋升、财政分权和腐败因素结合起

* 郭广珍，复旦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邮政编码：200433；辽宁大学比较经济体制研究中心，邮政编码：110036，电子邮箱：ggzmail@yahoo.com.cn；李绍平，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邮政编码：100101；黄险峰，辽宁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110036。

本文受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重大项目（2009JJD790020）“政府的组织结构、激励与经济增长”、辽宁大学 211 项目（三期）“中国改革与增长新政治经济学”和辽宁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项目“地方官员行为与经济发展研究”资助。本文曾在 2010 年第十届中国经济学会年会、2010 年制度经济学国际研讨会和 2010 年中国青年经济学家联谊会（YES）上宣读，作者感谢与会人员和匿名审稿人的意见，文责自负。

来考虑,本文正是为了弥补这种不足而试图将官员行为的多个方面纳入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全面地考察不同因素对官员行为的影响^①。本文的内容是这样安排的,第二部分是模型构造,我们同时将财政分权、政治晋升以及腐败问题纳入模型中,得出官员的最优行为,并分析各个因素对官员行为的影响,以及背后的经济解释;第三部分是对模型的扩展,我们将分析官员腐败可能被惩罚时的情况,并讨论了在这一新的假设下,其他因素对官员行为的影响;第四部分是小结。

二、模型构造

(一)行为假设

在我们的模型中,存在三个行为者,中央政府、地方政府^②和企业。为了分析政治晋升中的锦标赛机制,本文假设有两个地区,每个地区都有一个地方政府和一个企业。而且为了简化分析和研究集中,我们假设不存在地区保护行为,也不存在两个地区相互的外部性问题。

首先,对于中央政府而言,我们假设它是一个外生行为主体,也就是说它并不参与博弈,而仅仅外生地决定财政分权比例(γ)和税率(t)^③。国家的总税收为 $T = T_1 + T_2 = t(Q_1 + Q_2)$,其中 t 为税率, Q_i 为 i 地区的产量。因此,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分配的税收分别为 $(1 - \gamma)t(Q_1 + Q_2)$ 和 $\gamma t Q_i$ 。

其次,我们假设影响地方官员行为的因素有三个,即政治晋升、财政分权和腐败,其实前两个因素属于经济领域,后一个因素属于政治领域。在财政分权和腐败方面,按我们以上的设定,地方政府可以分到的财政资金为 γ ,即地方官员可以控制的财政资源为 $\gamma t Q_i$ 。我们假设地方官员对这些财政资源配置方式有两种:第一种是进行公共设施建设,在我们的模型中,这些投资可以提高当地企业的产出;第二种就是用于在职消费或者腐败。当然,文献中衡量地方官员的腐败方法有很多种,而本文采用配置在提高官员自身^④效用的资源衡量腐败。我们假设投入公共支出 $g_i (i = 1, 2)$ 的比例为 $(1 - \chi)$,即 $g_i = (1 - \chi)\gamma t Q_i$,则用于腐败的为 $\chi\gamma t Q_i$ 。

在政治晋升方面,地方官员可以被看做中央政府的代理人,由于其努力(a_i)不能被中央政府观察,因此中央政府只能选择其他指标对其进行激励。这里我们认同中国中央政府将 GDP 作为一个可观察的指标的假设(周黎安 2007; Li and Zhou 2005),这样在不同地方政府间会形成政治晋升的锦标赛机制。在这种机制下,如果一个地区的产出(即该企业的产出)大于另一个地区的产出,那么这一地区的领导人就会得到提拔,并且可以获得 V 的效用,否则如果得不到晋升,其政治方面的效用就是 0。当然,无论他是否获得晋升,都要付出成本 $\varphi(a_i)$ 。我们假设地方官员的努力成本函数为 $\varphi(a_i) = \frac{1}{2}a_i^2$ 。随机扰动项 e_i, e_j 独立同分布,并且 $(e_j - e_i)$ 服从 $[-\frac{1}{2\theta}, \frac{1}{2\theta}]$ ($\theta > 0$) 内的均匀分布(此假设仅仅为了后面计算的简便,当然使用其他的分布类型并不会影响我们后面的结论)。则地方官员的效用函数为:

$$U_i = \Pr(Q_i \geq Q_j) V - \frac{1}{2}a_i^2 + \chi_i \gamma t Q_i \quad (1)$$

再次,我们考虑企业的行为。为了简化分析,我们进一步假设每个企业都处于完全竞争市场中(因为我们假设没有地方保护行为),并将其产品的价格标准化为 1。按照上面的假设,地方官员在公共设施上的投入会影响企业的生产效率,进而影响企业的产量决策。而在分析公共支出的文献中,一些文献将公共设施支出 $((1 - \chi_i)\gamma t Q_i)$ 放入影响消费者的效用函数(Turnovsky and Fisher, 1995),另一些文献则将其放入企业的生产函数(Bucovetsky 2005)。我们依据后一类文献,而且为了便于计算,我们假设公共设施支出纳入到企业成本函数。具体而言,我们假设企业的生产成本函数为: $C_i(Q_i, a_i, \chi_i) = \frac{1}{2}Q_i^2 - a_i Q_i - (1 - \chi_i)\gamma t Q_i$,在这里

^①在较早的一篇文章中(郭广珍、彭坤 2011),我们提出了一个类似的思路,并没有进行严格的模型推论。

^②在民主集中体制下,其实就是地方官员,因此下面我们将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员混合使用,也就是说尽管地方政府是由很多行政人员构成,但是其行为和地方官员的行为高度一致。

^③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这里假定中央政府不进行公共设施投资(可以理解为即使投资也对地方政府没有激励作用),原因是我们的研究重点并不是中央政府行为的影响,而且这一假设也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因为,世界银行在 2001 年的报告中指出,中国大约 70% 的公共支出发生在地方。

^④当然,这里的地方官员也包括普通公务员,但我们可以假设普通公务员的效用增加会提高地方领导权威,进而提高领导的效用。

$(1 - \chi_i) \gamma t$ 为地方政府的公共投资 a_i 为地方官员的努力,且地方的公共投资没有外溢性(Tiebout ,1956)。

企业缴税为: $T = tQ$ 其中 t 为税率。这样企业 i 的利润函数即为:

$$\pi = (1 - t) Q_i - C_i(Q_i, a_i, \chi_i) \quad (2)$$

(二) 博弈与求解

此处博弈顺序为: 首先, 在观察到中央政府制定 t 与 γ 后, 并考虑到企业的行为, 地方政府同时选择 χ_i 和 a_i 的水平。其次, 企业观察到地方政府的行为后, 根据自己面临的约束做出选择。而在求解时, 我们采用逆向归纳: 先求企业最优决策, 然后, 地方政府选择 χ_i 和 a_i 的水平。

首先考察企业的最优行为。

按照 (2) 式, 可以得到企业的(预期) 利润函数为:

$$\pi = (1 - t) Q_i - \frac{1}{2} (Q_i)^2 + a_i Q_i + (1 - \chi_i) \gamma t Q_i$$

则其一阶条件为: $\frac{\partial \pi}{\partial Q_i} = (1 - t) - Q_i + a_i + (1 - \chi_i) \gamma t$

由此可求出:

$$Q_i^* = a_i + (1 - t) + (1 - \chi_i) \gamma t \quad (3)$$

其次, 分析地方官员的最优行为。

由于 $\Pr(Q_i \geq Q_j) = \Pr(a_i + (1 - t) + (1 - \chi_i) \gamma t + e_i \geq a_j + (1 - t) + (1 - \chi_j) \gamma t + e_j)$

$$= \Pr(e_j - e_i \leq (a_i - a_j) + (\chi_j - \chi_i) \gamma t)$$

$$= \int_{-\frac{1}{2\theta}}^{(a_i - a_j) + (\chi_j - \chi_i) \gamma t} \theta dx = \theta [(a_i - a_j) + (\chi_j - \chi_i) \gamma t + \frac{1}{2\theta}] \quad (4)$$

将 (3)、(4) 式代入 (1) 式得到地方官员的效用函数为:

$$U_i = \theta [(a_i - a_j) + (\chi_j - \chi_i) \gamma t + \frac{1}{2\theta}] V - \frac{1}{2} a_i^2 + \chi_i \gamma t (a_i + (1 - t) + (1 - \chi_i) \gamma t) \quad (5)$$

由其一阶条件可得:

$$\frac{\partial U_i}{\partial a_i} = \theta V - a_i + \chi_i \gamma t = 0$$

$$\frac{\partial U_i}{\partial \chi_i} = -\theta \gamma t V + \gamma t [a_i + (1 - t) + \gamma t - 2\chi_i \gamma t] = 0$$

即:

$$a_i = \frac{1}{2} \theta V + \frac{2\gamma t + 2 - 2t - \theta V}{6} \quad (6)$$

$$\chi_i = \frac{2}{3} + \frac{2 - 2t - \theta V}{3\gamma t} \quad (7)$$

(三) 对结果的分析

命题 1(影响 a_i 的命题): 如果政治晋升对官员效用影响(V) 越大、产出水平越确定(θ 越大)、分权程度(γ) 越高, 并且税收水平(t) 越低, 则官员的努力水平越高。

该命题可以通过 (6) 式对各个变量求偏导而很容易得到, 下面我们对每一项做逐一分析。首先有 $\frac{\partial a_i}{\partial V} = \frac{1}{3} \theta > 0$, 这一结论是很容易解释的, 因为 a_i 被定义为官员在政治晋升方面的努力, 所以当他政治收益的评价(V) 增大时, 其努力就会增加。

其次是 $\frac{\partial a_i}{\partial \theta} = \frac{1}{3} V > 0$, 该结论主要是因为我们假设 $(e_j - e_i)$ 服从 $[-\frac{1}{2\theta}, \frac{1}{2\theta}]$ ($\theta > 0$) 内的均匀分布, 当 θ 增大时, 其分布区间就越小, 进而, 其晋升的可能性就越大, 所以其努力也就越大。

再次我们可以得到 $\frac{\partial a_i}{\partial \gamma} = \frac{1}{3} t > 0$, 这一结论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它表明分权程度越强, 官员努力水平越高。Qian 等(1997) 也指出, 从中央将权力下放到地方政府导致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而傅勇(2008) 的实证研究表明, 财政分权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财政的激励作用, 而且这种情况并没有受到税制调整以及

大规模的垂直转移支付的影响。也就是说,至少在追求财政资源上,地方官员有很大的激励去提高地方的GDP。总之,财政分权确实增强了地方官员在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努力。

最后一项是 $\frac{\partial a_i}{\partial t} = \frac{\gamma-1}{3} < 0$, 该结论表明税收越高,努力水平却越低,当然,这是在分权的条件下 ($\gamma < 1$) 才成立的。^①

命题 2(影响 χ 的命题): 如果政治晋升对官员效用影响 (V) 越大,产出水平越确定 (θ 越大),腐败的程度 (χ) 就会越低; 当分权水平越高时,如果 $\theta V + 2t > 2$, 则贪污腐败水平 (χ) 会越高,否则如果 $\theta V + 2t < 2$, 则贪污腐败水平会越低^②; 当税率水平较高时,如果 $\theta V > 2$, 则贪污腐败水平 (χ) 会越高,相反如果 $\theta V < 2$ 时,则贪污腐败水平会越低。

该命题可以通过 (7) 式对各个变量求偏导而很容易得到,下面我们对每一项逐一分析。首先有 $\frac{\partial \chi_i}{\partial V} = -\frac{\theta}{3\gamma t} < 0$, 该结论表明如果官员对政治收益的评价 (V) 越大,也就是说,他对政治职业生涯越是看重,则其对属于经济领域的腐败就会变小。

其次是 $\frac{\partial \chi_i}{\partial \theta} = -\frac{V}{3\gamma t} < 0$, 该结论的原因和命题 1 中的是一致的,当 θ 增大时,其分布区间就越小,其晋升的可能性就越大。

再次,当 $\theta V + 2t > 2$ 即 $\chi_i = \frac{2}{3} + \frac{2-2t-\theta V}{3\gamma t} < \frac{2}{3}$ 时, $\frac{\partial \chi_i}{\partial \gamma} > 0$ 。也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下,分权水平的提高会导致贪污腐败水平升高^③。而且,如果我们考虑到地方官员的另一个决策变量“努力”的话,将努力和腐败统一起来解释,我们的结论就很容易理解了: 地方官员为了最大化效用,晋升收益主要通过提高努力程度实现,而在这个前提下,努力的不确定性越小、晋升收益越大,地方官员则可以更加放心地攫取更多的自身消费利益。

在理论上,很多文献指出,政府分权很可能会增加贿赂行为的发生 (Shleifer and Vishney, 1993; Ehrlich and Lui, 1999; Berkowitz and Li, 2000)。而相应的实证研究也验证了这一结论, Treisman (2000) 通过研究发现联邦制国家拥有更高的腐败率。Che (2002) 基于中国的研究表明,分权使得地方官员尽可能地为自己寻求利益和租金。而 Young (2000) 将分权的概念不仅仅限制在财政方面,他的研究指出改革初期的分权政策,如价格双轨制,或者分地区的改革试点等,反而使地方官员的寻租可能性和收益都大大增加。吴一平 (2008) 利用各种分权指标进行分析,发现财政分权恶化了腐败问题,即财政分权与腐败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而且,在一些具体事务上,如土地违法行为,分权也导致了腐败。梁若冰 (2009) 利用中国 30 个省、市、自治区在 1999-2005 年间的面板数据分析表明,地方政府的财政分权指数与地方政府的土地违法行为呈现显著的正相关。

而当 $\theta V + 2t < 2$ 时,也即贪污腐败的水平比较高时,有 $\frac{\partial \chi_i}{\partial \gamma} < 0$ 。也就是说,此时分权水平越低,即越集权的话,腐败的程度会越高。

已有的很多文献也都指出,分权化或联邦制通过增加区域间的竞争,可以减少腐败官僚接受贿赂的数量 (Bernnan and Buchanan, 1980; Weingast, 1995), 而 Fisman 和 Gatti (2002a, 2002b), Huther 和 Shah (1998) 检验了财政分权与腐败之间的关系,发现分权与腐败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在中国方面,1994 年的分

①需要重点指出的是,我们这里发现此时得到的 a_i 与 a_j 无关,这似乎与传统的锦标赛模型 (周黎安, 2004) 不同。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我们对于 $(e_j - e_i)$ 分布的设定,但是我们说这种设定并不会影响模型的基本结论。可作以下考虑,由于我们假设两个地方官员的成本函数相同,可以考虑其采用的对称策略,此时得到关于 a_i 与 a_j 的方程,而联立以后即可以得到各自的表达式是关于与我们先前相同的参数的函数,而结论并不会改变。

②其实如果我们同时考虑两个因素的影响,结果就完全确定了,因为无论是 $\frac{\partial \chi_i^2}{\partial \gamma \partial t}$ 、 $\frac{\partial \chi_i^2}{\partial \gamma \partial \theta}$ 还是 $\frac{\partial \chi_i^2}{\partial \gamma \partial V}$ 都是确定大于 0 的。但这是让两个变量同时变动产生的结果,从而完全不能分清是哪一个因素作用的,使得分权的作用更加不清楚。

③当然,因为此时有: $\chi_i = \frac{2}{3} + \frac{2-2t-\theta V}{3\gamma t} < \frac{2}{3}$, 即腐败的比例也不会太高!

税制改革使分权水平下降了,陈抗等(2002)研究指出,其产生的结果导致了地方政府从“援助之手”变为了“攫取之手”。而用我们模型的解释是,相对其他收益而言,一些地方官员在政治晋升竞争过程中获得的收益(θV)变小了。

最后是税率对腐败的影响,上面的命题表明这一影响和来自政治晋升的效用(θV)有关。当 $\theta V > 2$ 时, $\frac{\partial \chi_i}{\partial t} = -\frac{2-\theta V}{3\gamma t^2} > 0$, 其含义是,当来自政治晋升方面的收益大于一定临界值时,腐败的程度会随着税率的提高而强加。这一结论不太直观,我们需要从以下两点对其进行解释:其一,我们在这一部分假设官员腐败并不会得到惩罚,在下一部分,我们将扩展这一假设,并会得到更加直观的解释;其二,我们需要注意企业行为的影响,因为对于地方政府而言,企业产出越高,该地方官员在政治锦标赛中获胜的概率也越高^①。尽管税收提高会降低企业的产量,进而地方官员政治晋升概率也会降低,但在 θV 较高时,晋升概率对效用的影响相对不重要了,而当税率较高时,地方分得的财政总量会扩大,进而腐败的收益会增大。

相反地,当 $\theta V < 2$ 时, $\frac{\partial \chi_i}{\partial t} = -\frac{2-\theta V}{3\gamma t^2} < 0$ 。也就是说,当来自政治晋升方面的收益比较小时,腐败的程度会随着税率的提高而下降。

三、模型的扩展:对腐败进行处罚的情况

上面在分析腐败时,只讨论了它对地方官员的好处,其实现实中地方官员腐败后可能会被发现。在本部分我们假设地方官员腐败后可能会被发现,其概率为 ρ ,而且官员被发现后被处罚 S ^②,并假设 S 与其腐败数量 $\chi \gamma t Q$ 成比例,即 $S = s \chi \gamma t Q$, $0 < s < 1$ 。

(一) 博弈与求解

在这种假设下,企业的行为并没有变化,而地方官员的效用函数变为:

$$U_i = \Pr(Q_i \geq Q_j) V - \frac{1}{2} a_i^2 + (1-\rho) \chi_i \gamma t Q_i - \rho s \chi_i \gamma t Q_i \quad (8)$$

其中:

$$\begin{aligned} \Pr(Q_i \geq Q_j) &= \Pr(a_i + (1-t) + (1-\chi_i) \gamma t + e_i \geq a_j + (1-t) + (1-\chi_j) \gamma t + e_j) \\ &= \Pr(e_j - e_i \leq (a_i - a_j) + (\chi_j - \chi_i) \gamma t) \\ &= \int_{-\frac{1}{2\theta}}^{(a_i - a_j) + (\chi_j - \chi_i) \gamma t} \theta dx = \theta [(a_i - a_j) + (\chi_j - \chi_i) \gamma t + \frac{1}{2\theta}] \end{aligned} \quad (9)$$

将(3)式和(9)式代入(8)式得到地方官员的效用函数为:

$$U_i = \theta [(a_i - a_j) + (\chi_j - \chi_i) \gamma t + \frac{1}{2\theta}] V - \frac{1}{2} a_i^2 + (1-\rho(1+s)) \chi_i \gamma t (a_i + (1-t) + (1-\chi_i) \gamma t) \quad (10)$$

分别对 χ_i 和 a_i 求一阶条件有:

$$\begin{aligned} \frac{\partial U_i}{\partial a_i} &= \theta V - a_i + (1-\rho(1+s)) \gamma t \chi_i = 0 \\ \frac{\partial U_i}{\partial \chi_i} &= -\theta \gamma t V + (1-\rho(1+s)) \gamma t [a_i + (1-t) + \gamma t - 2\gamma t \chi_i] = 0 \end{aligned}$$

令 $\lambda = \rho(1+s)$, 即有:

$$a_i = \frac{\theta V}{(1+\lambda)} + (1-t + \gamma t) \frac{(1-\lambda)}{(1+\lambda)} \quad (11)$$

$$\chi_i = \frac{1-t + \gamma t - (\frac{\lambda}{1-\lambda}) \theta V}{(1+\lambda) \gamma t} \quad (12)$$

^①需要注意的是,我们这里并没有像其他文献,如 Shleifer 和 Vishny(1994)那样假设企业向地方官员行贿。

^②当然,就现实情况看,如果官员腐败被发现的话一定会影响其晋升的概率,但是为了保持与前面模型形式上的统一,我们将对晋升的影响转换为相应的处罚,也就是说,这里的 S 不仅代表实际中的货币处罚,还代表一部分因晋升概率下降而造成的负效用。

(二)对结果的解释

命题3(影响 a_i 的命题):当政治晋升对官员效用影响(V)越大、产出水平越确定(θ 越大)、税率越低时,官员努力水平越高。而如果分权水平提高,当 $\lambda = \rho(1+s) < 1$ 时,官员努力水平会越高;但当 $\lambda = \rho(1+s) > 1$ 时,官员努力水平却会降低。

通过与命题1进行对比,我们发现政治晋升对官员的重要性、产出水平的确定性以及税率对官员努力水平的影响是相同的,因为我们可以通过(11)式很容易地得到: $\frac{\partial a_i}{\partial V} = \frac{\theta}{1+\lambda} > 0$, $\frac{\partial a_i}{\partial \theta} = \frac{V}{1+\lambda} > 0$, $\frac{\partial a_i}{\partial t} = -\frac{(1-\lambda)(1-\gamma)}{(1+\lambda)} < 0$ 。

但与命题1相比,分权程度对努力的影响却变得不确定了。当 $\lambda = \rho(1+s) < 1$ 时, $\frac{\partial a_i}{\partial \gamma} = \frac{(1-\lambda)t}{(1+\lambda)} > 0$,即分权程度越高,官员努力水平会越高;但当 $\lambda = \rho(1+s) > 1$ 时, $\frac{\partial a_i}{\partial \gamma} = \frac{(1-\lambda)t}{(1+\lambda)} < 0$,财政分权的程度提高,会降低官员的努力水平。因此,在这一新的假设下,提高分权程度却可能会使官员的努力水平降低。

其实,很多关于财政分权综述的文献(杨其静、聂辉华,2008;郭广珍,2010)指出,学术界对于分权与经济发展,进而与努力程度相关性的研究结论并不完全一致。仅就中国的实证研究而言,林毅夫和刘志强(2000)利用1970-1993年间的省级数据证实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而Zhang和Zou(1998)为了验证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利用1978-1992年的省级数据检验,却发现二者并没有呈现正相关关系。张晏和龚六堂(2005)利用28个省市1986-2002年的数据所做的实证分析显示,中国的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在1994-2002年间为显著正相关,在1986-1993年却变成了负相关。而我们的模型则给出导致这种混乱产生的原因,即与对官员努力(a)的激励程度不同有关。

命题4(惩罚如何影响 a_i 的命题):如果对官员腐败惩罚得越严厉(s 越高),对官员腐败的惩罚越准确(ρ 越高),官员努力水平越低。

该命题的证明也非常简单,因为 $\frac{\partial a_i}{\partial \lambda} = -\frac{\theta V + 2(1-t+\gamma t)}{(1+\lambda)^2} < 0$ ($\lambda = \rho(1+s)$),所以 a_i 与 λ ,即 $\rho(1+s)$ 的变动方向是相反的。对此,我们可以按照模型逻辑给出以下解释。官员提高努力(a_i)的原因是努力可以增加产量(Q),产量的增加又导致总税收的增加。而在分权比例不变时,地方官员可以支配的财政资源($\gamma t Q$)也会增加,这样官员追求的腐败数量($\lambda \gamma t Q$)才会增加。但是当对腐败的惩罚($\rho(1+s)$)太重时,官员的总效用就会下降^①,从而导致官员的努力水平下降。

命题5(影响 χ 的命题):政治晋升对官员效用影响(V)越大、产出水平越确定(θ 越大),腐败会越低;在分权水平越高时,如果 $\theta V > \frac{1-\lambda}{\lambda}(1-t)$,则贪污腐败水平会越高,否则如果 $\theta V < \frac{1-\lambda}{\lambda}(1-t)$,则贪污腐败水平会越低;当税率水平较高时,如果 $\theta V > \frac{1-\lambda}{\lambda}$,则贪污腐败水平会越高;相反如果 $\theta V < \frac{1-\lambda}{\lambda}$ 时,则贪污腐败水平会越低。

因为 $\frac{\partial \chi_i}{\partial V} = -\frac{\lambda \theta}{(1-\lambda^2)\gamma t} < 0$, $\frac{\partial \chi_i}{\partial \theta} = -\frac{\lambda V}{(1-\lambda^2)\gamma t} < 0$,所以政治晋升给官员带来的效用越高、产出水平越确定时,贪污腐败的水平就会越低。通过与命题2的比较发现这两项对腐败的影响没有发生变化,这一结论也是符合直觉的,而原因也和命题2一样。

下面考察分权对腐败的影响,我们可以发现当 $\theta V > \frac{1-\lambda}{\lambda}(1-t) = (\frac{1}{\rho(1+s)} - 1)(1-t)$ 时,有 $\frac{\partial \chi_i}{\partial \gamma} = -\frac{1-t-(\frac{\lambda}{1-\lambda})\theta V}{(1+\lambda)t\gamma^2} > 0$; $\theta V > \frac{1-\lambda}{\lambda}(1-t) = (\frac{1}{\rho(1+s)} - 1)(1-t)$ 时, $\frac{\partial \chi_i}{\partial \gamma} = -\frac{1-t-(\frac{\lambda}{1-\lambda})\theta V}{(1+\lambda)t\gamma^2} < 0$ 。而税率对腐败的影响则是,当 $\theta V > \frac{1-\lambda}{\lambda}$ 时, $\frac{\partial \chi_i}{\partial t} = -\frac{1-(\frac{\lambda}{1-\lambda})\theta V}{(1+\lambda)\gamma t^2} > 0$;当 $\theta V < \frac{1-\lambda}{\lambda}$ 时, $\frac{\partial \chi_i}{\partial t} = -\frac{1-(\frac{\lambda}{1-\lambda})\theta V}{(1+\lambda)\gamma t^2} < 0$ 。

^①这一点也可以从官员的效用函数(10)式中看出,其中 $\rho(1+s)$ 前是负号。

通过与命题 2 的比较发现,这两个结论的基本特征并没有发生变化,即分权和税率对腐败的影响都取决于 θV 的取值范围,而且都是当 θV 大于特定值时与腐败正相关,小于特定值时,二者负相关。不同的是该具体的特定值发生了变化,即由原来的 2 (或 $2(1-t)$) 变成了 $\frac{1-\lambda}{\lambda}$ (或 $\frac{1-\lambda}{\lambda}(1-t)$) ①。

命题 6 (惩罚如何影响 χ 的命题): 官员腐败惩罚得越严厉 (s 越高), 对官员腐败的惩罚越准确 (ρ 越高), 官员腐败的程度就会越低。

同样地,该命题可以通过 $\frac{\partial \chi_i}{\partial \lambda} = -\frac{1(1-t+\gamma t)(1-\lambda)^2 + \theta V(1+\lambda^2)}{\gamma t(1+\lambda)^2} < 0$ 得到证明。该命题的经济学含义也是很直观的,其实 Shleifer 和 Vishny (1993) 早就指出,在中央政府不够强大时,将不能约束其代理人(也就是地方官员),腐败行为也许会变成盗窃型的腐败 (corruption with theft), 即官员在向个人索取了官方价格 (即国家税收等制度的税额) 后,还索要额外贿赂。此外,很多法与经济学的论文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

另外,如果我们将该命题与命题 4 结合起来,竟然会得到一个支持“腐败是‘润滑剂’的假说”的结论 (Leff, 1964; Huntington, 1968; Beck and Maher, 1986; Barreto, 2001)。因为当腐败惩罚变严厉时,腐败程度也会降低,但是根据命题 4,这却导致了官员努力的下降,而官员努力下降则进一步导致产量的降低。也就是说,腐败下降导致了产量的下降,即二者是正相关关系,而这正是腐败“润滑剂”假说的核心论点!当然,这只是理论结论,它的成立是有严格条件限制的,现实中是否如此还要以实证研究为准。

四、结论

新古典理论告诉我们,研究问题时要集中分析特定因素的影响,而要将其他因素假设为不变。然而,在研究政治与经济相互影响的复杂问题上,假定其他因素不变与现实冲突太大了。因此,Acemoglu (2010) 指出,在分析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学问题时,特别是经验研究,一定要坚持一般均衡的思路,而构建一般均衡的理论框架显然是相关工作的第一步。鉴于目前学者已经做了大量的关于中国地方官员行为的经验研究工作,我们认为相关的理论工作也应该相应地推进,本文就是在这一想法下产生的。

当然,我们的模型还相当的简略,例如,尽管我们试图考虑到更多方面,但是出于数学处理上的方便和篇幅限制等因素的考虑,我们还是舍弃掉了一些很重要的方面,如我们并没有让中央政府参与博弈,而且假设中央政府不能对公共设施进行投资,但是在 1994 年的分税制改革以后,这种情况在中国变得特别重要。不过,我们想做的只是为实证研究提供一个可能的思路,为理论研究提供一个边际补充。

参考文献:

1. 陈抗、Arye L. Hillman、顾清扬 2002 《财政集权与地方政府行为变化——从援助之手到攫取之手》,《经济学(季刊)》第 2 卷第 1 期。
2. 傅勇:2008 《财政分权改革提高了地方财政激励强度吗》,《财贸经济》第 7 期。
3. 傅勇、张晏:2007 《中国式分权与财政支出结构偏向:为增长而竞争的代价》,《管理世界》第 3 期。
4. 郭广珍 2009 《政治收益、经济贿赂与经济绩效:一个新古典政治经济学模型》,《南方经济》第 11 期。
5. 郭广珍 2010 《地方官员行为与经济发展:一个基于政治晋升、财政分权与腐败的文献综述》,《制度经济学研究》第 3 期。
6. 郭广珍、彭坤 2011 《地方官员行为与经济发展:一个分析框架》,《当代经济科学》第 2 期。
7. 梁若冰 2009 《财政分权下的晋升激励、部门利益与土地违法》,《经济学(季刊)》第 9 卷第 1 期。
8. 林毅夫、刘志强 2000 《中国的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第 4 期。
9. 王贤彬、徐现祥 2009 《转型期的政治激励、财政分权与地方官员经济行为》,《南开经济研究》第 2 期。
10. 吴一平 2008 《财政分权、腐败与治理》,《经济学(季刊)》第 1 期。
11. 杨其静、聂辉华 2008 《保护市场的联邦主义及其批判》,《经济研究》第 3 期。
12. 张晏、龚六堂 2005 《分税制改革、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经济学(季刊)》第 1 期。
13. 周黎安 2004 《晋升博弈中政府官员的激励与合作——兼论我国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问题长期存在的原因》,《经济研究》第 6 期。

①当然,我们还可以对这两个条件进行比较,如考察税率对腐败的影响。由于 $\frac{1-\lambda}{\lambda} = \frac{1-\rho(1+s)}{\rho(1+s)} = \frac{1}{\rho(1+s)} - 1$, 所以当 $\rho < \frac{1}{3(1+s)}$ 时, $\frac{1-\lambda}{\lambda} > 2$ 。即当对腐败的惩罚概率 ρ 较小时,官员晋升的效用 (θV) 要足够大时 ($\theta V > \frac{1-\lambda}{\lambda} > 2$) 税收的提高才会增加腐败的程度。否则,当 $\rho > \frac{1}{3(1+s)}$ 时, $\frac{1-\lambda}{\lambda} < 2$ 。即当对腐败的惩罚概率 ρ 较大时,官员晋升的效用 (θV) 只要大于一个较小的值 ($\theta V > \frac{1-\lambda}{\lambda} < 2$) 税收的提高就会增加腐败的程度。

14. 周黎安 2007.《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第7期。
15. 周黎安著 2008《转型中的地方政府》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90-232页。
16. Acemoglu ,D. 2010. "Theory ,General Equilibrium and Political Economy in Development Economics. " NBER Working Paper 15944.
17. Barreto ,Raul A. 2001. "Endogenous Corruption ,Inequality and Growth: Econometric Evidence. " School of Economics ,Adelaide University ,Working Paper No. 01 - 2.
18. Beck ,Paul J. ,and Michael Mather. 1991. "The Impact of the 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 on US Exports. " *Managerial and Decision Economics* ,12(4) : 295 - 303.
19. Berkowitz ,D. ,and W. Li. 2000. "Tax Rights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A Tragedy of the Common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 76(3) : 369 - 397.
20. Bucovetsky S. 2005. "Public Input Competition. "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89(9 - 10) : 1763 - 1787.
21. Che ,J. 2002. "Rent Seeking and Government Ownership of Firms: An Application to China' s Township Village Enterprise. "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30(4) : 787 - 811.
22. Ehrlich ,J. ,and F. Lui. 1999. "Bureaucratic Corruption and Endogenous Economic Growth. "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 107(S6) : S270 - S293.
23. Fisman ,R. ,and R. Gatti. 2002a. "Decentralization and Corruption: Evidence across Countries. "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 83(3) : 325 - 345.
24. Fisman ,R. ,and R. Gatti. 2002b. "Decentralization and Corruption: Evidence from US Federal Transfer Programs. " *Public Choice* , 113(1 - 2) : 25 - 35.
25. Huntington Samuel P. 1968.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6. Huther J. ,and A. Shah. 1998. "Applying a Simple Measure of Good Governance to the Debate on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 World Bank Working Paper 1894.
27. Leff Nathaniel. 1964. "Economic Development through Bureaucratic Corruption. " *The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8(2) : 8 - 14.
28. Li ,H. 2003. "Governments' Budget Constraint ,Competition and Privatiz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 s Rural Industry. "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31(4) : 486 - 502.
29. Li ,H. ,and L. Zhou L. "Political Turnover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The Incentive Role of Personnel Control in China. "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89(9 - 10) : 1743 - 62.
30. Qian ,Y. ,and Barry R. Weingast. 1997. "Federalism as a Commitment to Preserving Market Incentives. " *The Journal of Economy Perspective* ,11(4) : 83 - 92.
31. Saich ,T. 2002. "The Blind Man and the Elephant: Analysing the Local State in China. " In *On the Roots of Growth and Crisis: Capitalism ,State and Society in East Asia* ,ed. L. Tomba 92 - 96. Milan: Annale Feltrinelli.
32. Shleifer ,A. ,and R. Vishny. 1993. "Corruption. "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8(3) : 599 - 617.
33. Shleifer ,A. ,and R. W. Vishny. 1994. "Politicians and Firms. "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9(4) : 995 - 1025.
34. Tiebout ,C. A. 1956. "Pure Theory of Local Expenditure. "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64(4) : 416 - 24.
35. Treisman ,D. 2000. "The Causes of Corruption: A Cross - national Study. "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76(3) : 399 - 457.
36. Turnovsky S. J. ,and W. H. Fisher. 1995. "The Composition of Government Expenditure and its Consequences for Macroeconomic Performance. " *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 ,19(4) : 747 - 786.
37. Weingast ,B. 1995. "The Economic Role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Market - Preserving Federalis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 ,1(1) : 1 - 31.
38. Young ,Alwyn. 2000. "The Razor' s Edge: Distortions and Incremental Reform in 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 "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mics* ,115(4) : 1091 - 1135.
39. Zhang ,T. ,and H. Zou. 1998.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Public Spending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67(2) : 221 - 240.

A Research on the Behavior of Local Government Official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Promotion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Corruption

Guo Guangzhen^{1 2} Li Shaoping³ and Huang Xianfeng⁴

(1: Postdoctoral Mobile Station in Theoretical Economics ,Fudan University;

2: Center for Research on Comparative Economics System ,Liaoning University;

3: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and Natural Resources ,CAS; 4: School of Economics ,Liaoning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is paper , we attempt to consider the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 political promotion and corruption simultaneously and build a unified mathematical model. The main conclusion is that , in the basic model , the higher the local officials' preferences to political promotion , the higher the level of their effort and the lower the level of corruption. The higher the degree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 the higher the level of the officials' efforts , but the impact on the level of corruption is uncertain. Further , we expand the model by assuming that corruption will be punished. In this expanded mode , most of the conclusions of the basic model have not changed much , but the impact of the decentralization degree on efforts become uncertain. In addition , we further study the impact of the intensity and the accuracy of punishment. The related proposition shows that , more severe and more accurate the punishment of official corruption , both the level of official effort and corruption will be lower.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proposition , we also explain the results of previous literature.

Key Words: Political Promotion;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Corrup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JEL Classification: D73 ,H30 ,O17

(责任编辑: 孙永平、陈永清)